



##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 战略支持

胡德坤

**摘要:**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虽无完整统一的战略配合计划,但据日本战史资料记载,实际上却在对日作战方面做到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抗战,在日本制订对正面战场的作战计划及具体作战中起了重要的牵制作用,使日本在对正面战场作战时,不得不顾及敌后战场的牵制和制约,被迫进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最终战败投降。可见,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中国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关键词:** 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 战略支持

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sup>①</sup>国民党战场即国民党领导下的正面战场,解放区战场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国敌后战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日本占领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扩展、抗日武装的壮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成为中国抗日的另一个战场。

### 一、敌后战场对日本作战计划的牵制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华北会战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并迅速从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1938年5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两岸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此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互相呼应、互相补充、里应外合,坚持持久抗战,迫使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导致日本对华战略与作战计划屡遭变更。

1938年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武汉会战计划时,原准备由日本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线南下,与日本华中方面军沿长江西进夹击武汉。后来考虑到华北地区八路军频繁出击而导致“治安不良”,难以抽出兵力,从而放弃了沿平汉线南下参加武汉会战的计划<sup>②</sup>。由于八路军的牵制,日本华北方面军未能南下与日本华中方面军两面夹击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943页。

<sup>②</sup>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东京:朝云新闻社1976年,第109页。

武汉,为国民党军队进行武汉保卫战争取了时间和空间。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昭和十三(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指出:“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按照这一总方针,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对占领地区的政策,应把治安第一作为当前的目标”,“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在国民政府军控制的“作战地区”,配置兵力“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仅起到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压制国民党军队的作用<sup>①</sup>。即是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不准备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治安战”,则要配备重兵,这就意味着敌后战场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日本对华军事作战的主要目标,这对刚刚进行完武汉会战急需休整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喘息的机会,是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重大战略支持。

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决定1939年度的军事作战主要是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作战目标是占领区内的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分三期进行。在制订计划时,日军还比较重视占领区内国民党军队的存在,一度把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八路军同等看待。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被击溃。经过第二期“肃正作战”,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出了占领区。这时,日军才深感在占领区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八路军。在第三期“肃正作战”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sup>②</sup>。即是说,1939年底至1940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已开始将作战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从而减轻了华北正面战场的压力。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给日本中国派遣军<sup>③</sup>下达《大陆命第三百六十三号》命令,规定日本华北方面军负责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第十三军负责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第十一军配合向国民党发动的政治攻势,以武汉为中心,在安庆,信阳,岳州(阳)、南昌一带展开军事作战;第二十一军驻守广州地区,负责切断国民党政府的外援之路。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24个师团,其中,日军第二十一军的4个师团只起战略牵制作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9个师团1个骑兵兵团,日军第十三军的4个师团,主要任务是在华北、华中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只有驻守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主要是对正面战场作战<sup>④</sup>。在这一部署中,日本中国派遣军有13个师团是针对敌后战场的,而只有11个师团是针对正面战场的,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已经向敌后战场转移。1939年12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会议认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共产党组织也深入到了通县、黄村(大兴)县的民众之中。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为此,加强情报收集,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sup>⑤</sup>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打破这种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sup>⑥</sup>。1940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有这样的记载:八路军“占据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盘”,河北省“已成了中共独占的活动舞台,是成立新中央政权(指汪精卫伪政权)的一大障碍”<sup>⑦</sup>。可见,八路军由于力量的壮大已被为日本华北方面军视为主要对手。

1940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4月至9月,第二期10月以后。根据两期作战设想,日本华北方面军规定治安作战的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军队”。继而又在《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要纲》中指出,“以治安第一为基调”,“将作战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军队方面”;在该文件的《要领》中指出,“实施彻底讨伐肃正”,“讨伐重点置于剿灭共产党军队”<sup>⑧</sup>。据日

① 白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第553~554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144页。

③ 1939年9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日本华北方面军、驻上海的第十三军、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和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7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145页。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15页。

⑦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184页。

⑧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64~268页。

本《战史丛书》记载,日军的“肃正作战”,“虽然比较容易击破重庆政府军队,但中共军队采取退避分散战法,捕捉击灭极其困难。”“中共组织民众,实施扩军工作,滚雪球式地扩大党和军队势力。”<sup>①</sup>这表明,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将军事作战重点指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但经过日军多次“肃正作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不仅没有被击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40年5—6月,欧洲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军队闪击西欧,击败英、法军队,法国败降。在日本的威逼之下,6月12日,荷属东印度当局宣布取消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的限制,继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关闭越中交通线,7月17日,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英、法等国的对日妥协退让,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发动宜昌作战,于6月12日攻占宜昌。从6月至8月,日本陆海军对重庆等地进行了4000多架次的空袭和轰炸,给重庆等地造成了重大的损害<sup>②</sup>,对国民政府产生了重大压力。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不利局面,蒋介石出现了抗战以来的严重动摇,在国民党内也涌动着一股投降暗流,蒋介石的代表同日方代表的秘密会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甚至于7月23日签订了备忘录,同意8月上旬在长沙由蒋介石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当面协商日中停战问题<sup>③</sup>。在这危机关头,1940年8月,八路军出动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表达了中国抗战力量的抗战决心,遏制了国民党内的投降暗流,也坚定了蒋介石的抗战信心。1941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官会议,决定将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和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封锁战”,作为当前对华政策的两大内容。其中重点是进行“治安战”,“治安战”的主战场放在华北。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中国派遣军正式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日军将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表明敌后战场名副其实地担负看中国抗战主战场的重任,也就意味着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

1941—1943年,日本对正面战场只是“封锁战”和“短促作战”,即是说,敌后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抗击着大部分侵华日军,为正面战场提供了难得的训练整顿、积蓄力量的机会。1942年4月,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提议,要利用太平洋战场的初战胜利来解决中国问题。5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最重要的是,无论处于何种形势,对处理中国事变必须倾注全力,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为此,如全盘形势许可,今年秋季进行西安及宝鸡方面作战,以摧毁敌之西北根据地,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同时,加强对重庆的压迫态势。”“此时,若重庆政府不肯屈服,根据情况,明春以后伺机实施更积极的作战,以政治谋略相配合,促使重庆屈服或崩溃。”根据以上考虑,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准备进行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西安作战的目的是,“歼灭西安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的要地,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同时加强对重庆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谋略的推进。”四川作战的目的是,“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的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并攻占该平原要地,以政谋略相配合,促进重庆政权的屈服、崩溃或分裂。”在准备西安作战、四川作战的同时,“确保现占领区”<sup>④</sup>。可见,自1941年起,日本对华作战重点进一步明确为敌后战场。但日本要发动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并非易事,其前提是能否摧毁敌后抗日区根据地,“确保现占领区”。

5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西安作战”计划,准备集中7个师团的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许多人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他们认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只进攻西安反而对华北的主要敌人中共军队有利。”“日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质。但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sup>⑤</sup>这种分析是日军内心的真实表白:日本同国民党的矛盾虽然尖锐,但还有“共存”的一面,而同中共的矛盾却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进攻西安反而有利于华北的八路军。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不同意进攻西安。可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297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191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250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第24~26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3》,第110~112页。

见,敌后战场的抗战使日本不敢肆意发动西安作战。在日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进行“西安作战”而不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于是,到6月,“西安作战”便并入了“四川作战”计划。

此时,日本急切期望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初战胜利解决中国问题,仍坚持要在中国发动大规模作战,打垮国民政府,结束中日战争。6月末,日本参谋本部“四川作战”计划出台,准备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对这一方案,日本中国派遣军经过反复研讨,深感没有胜算。8月25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拟在中国战场发动“四川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sup>①</sup>为此,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97万人,即增加36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18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作战时间预定为1943年春季以后<sup>②</sup>。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对“四川作战”深表怀疑,他认为,“进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以此打开局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如果从对美关系和我战力考虑,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来进攻重庆,但作为打开局面的穷极之策,陆军省也同意了参谋本部的意见……目前实施作战的可能性只有五五开。”<sup>③</sup>对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对参谋总长杉山提出,“根据最近通知的事项,中央虽已内定于9月实施西安作战,根据情况于明年实施四川作战,同时在占领地区维持治安。但若不增加很多兵力而实施以上作战,我军在占领地区内的治安不得不做出部分牺牲,希望预先予以考虑。”<sup>④</sup>就连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也认为四川作战计划不可能实现,他在参谋本部的《业务日志》中写到,“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这一点若无十分的把握,进攻重庆作战则就是极其危险的投机。”<sup>⑤</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当局深知,不解决中国问题就难以在太平洋战场同美国抗衡,而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四川作战。但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正在中国同敌后战场作战,要发动四川作战就要减少在敌后战场的兵力,这样一来,中共势力会乘机崛起,日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这是日本当局最大的后顾之忧。1942年12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康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到重创,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战计划彻底失去了信心,12月10日,下令停止“四川作战”准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坚持战斗在日军后方,使日本当局的许多对华战略、对华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经常改变,从而在战略层面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 二、敌后战场对日本在正面战场作战的牵制

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而且在具体的战役中也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如前所述,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治安肃正要纲》时,日军还比较重视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一度把国民政府军队和中共军队同等看待。经过日军两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出了占领区,在第三期“肃正作战”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由于中共在敌后开展的是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日军的“肃正作战”无功而返。据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回忆,在五台山作战中,“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建有根据地,曾认为可以逐步摸清情况,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如坠云雾,是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施过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周密巧妙,预期落空,毫无结果。”<sup>⑥</sup>日军深感八路军存在与发展直接威胁到其后方的安定,不打赢“治安战”,后方不稳定,也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分兵进攻在日本占领区周边的国民党军队。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 3》,第56页。

② 伊藤隆、照泽康孝:《现代史资料续 4. 陆军. 畑俊六日记》,东京:美铃书房 1983年,第384页。

③ 伊藤隆、照泽康孝:《现代史资料续 4. 陆军. 畑俊六日记》,第353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35·大本营陆军部 3》,东京:朝云新闻社 1969年,第195~196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18·华北的治安战 1》,第159页。

1941年2月16日至3月13日,日本第十三军出动三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向苏北地区发动“扫荡”作战,据日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日记记载,本次作战目的是:“一是击溃江北兵匪,特别是新四军,毁灭其地盘;二是扩大江北占领区域,打开物资流入的通道;三是处理(国民党政府)李明杨军队。”经过这次“扫荡”作战,国民党军队被击溃,李明杨率领4万人投降,但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在国民政府军队退出地区得到了发展,控制了盐产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日占区<sup>①</sup>。新四军的顽强作战,及时填补了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后留下的空白,使日军尝到了始料不及的苦果。1941年5月7日至6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晋东南的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24个师牵制了日军3个师团的兵力,便向中条山发动“中原会战”,击溃了国民党守军,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但其结果却大出日军意料,中共武装立即乘机进入中条山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反而给中共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参谋山崎重三少佐回忆,“中条山是蒋介石系统中央军扰乱治安的基地,这次的确遭受了铁锤般的打击。但‘扰乱治安基地’只是一个名义,实际并非如此,同共产党系统军队相比是极其低调的。然而,一旦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时,共产党军队便虎视眈眈,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建立根据地。因此,华北的游击战便为共产党军队所独占。”<sup>②</sup>在华中,自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后,新四军立即进入日军新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占领区“治安恶化”。1943年4月1日,日本大本营第十五课课长松谷诚大佐在向大本营汇报中认为,“中原会战、浙赣会战后,共产党新四军都进入了占领区,使日军进行扫荡作战的后方治安紊乱、恶化。共产党问题是很深刻的问题,从华北的现状也可以看到,同共产党的作战是变相的日苏战争”。4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会见汪精卫时,提议双方共同调查研究“关于共产党的对策”。5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大将在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对话中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区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sup>③</sup>。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对经过日军三年“扫荡”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情况做了如下估计:“日军占领着中国东部的重要地区,重庆政府被压迫于黄河以南的内陆及山岳地带,仅仅保住了残余势力。与此相反,中共军队乘日军转用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富庶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sup>④</sup>1944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指南》中指出,“由于皇军历次剿共作战的结果,将中共军政领导机关驱赶到很远的山间僻壤,使其独立抗战活动显著下降。但纵观占领区内的全盘治安形势,难以说治安提高了,相反,却出现了恶化而又复杂化的趋势。”<sup>⑤</sup>可见,无论是华北还是华中日本占领区,即使日本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被打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扎根于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坚守抗日根据地,从而有利于全国的抗战。

1944年,日本法西斯进入了内外交困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兵分两路向日本太平洋战线进行“双叉冲击”,使日本当局精心构造的“绝对国防圈”开始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便绞尽脑汁寻找死中求活的出路,决定使用13个师团的庞大兵力,于4月至12月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打通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贯通日本与南洋地区的联系,以便在太平洋与美英盟国进行长期战争。由于发动“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日本不能不减少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华北方面军预料,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敌后战场必定会发动反攻。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宣称中国已进入反攻阶段,号召准备总反攻,展开了顽强的政治攻势”。“中共的总反攻并非徒劳地进行困难的单纯的军事进攻,而是通过政治攻势争取(汪伪)新政权的武装团体,使其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反叛。同时,以(汪伪)新政权的工作人员为内应,策动我方地区内民众一起举行武装起义。”中共的反攻“并没有一定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78~379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第480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第407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4·河南会战》,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第74~75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第478页。

的战线，而是在我占领区内各地进行。”“中共的总反攻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国内实际情况，难有急剧的转变。但他们正采取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相配合、与（策动汪伪）新政权里应外合的策略，避免欲速而不达，稳扎稳打。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必然会实施总反攻，预计将会选择战略要地，在各个地方分别开始行动。”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对中共总反攻的对策是：“（1）粉碎中共对（汪伪）新政权的策动和利用；（2）事先歼灭中共的抗战力量，彻底摧毁其总反攻的准备工作；（3）加强改善对中共的情报调查活动；（4）针对中共里应外合袭击，进行应对战术研究。”<sup>①</sup>由此可见，1944年日本要对正面战场实施“一号作战”，不得不应对敌后战场的反攻，而不能抽调更多的兵力。经过历时8个月的“一号作战”，日军打通了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击溃了沿途的国民党军队，从表面看，日军战果赫赫，但从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由于“一号作战”，日本原占领区兵力减少，后方空虚，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乘机开始了反攻作战，日军不得不退守“点”（大城镇）和“线”（重要交通线），使日本原占领区面积急剧缩小。正如日本华北方面军从“一号作战”一开始就担心，“中共军队会乘机出动，犹如失去了重石的腌菜一样，急剧变轻浮向水面。”在“一号作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郁三郎中将向大本营报告说，“原日本占领区的治安急剧恶化了”<sup>②</sup>。据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回忆：“当时的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收集不准确，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没有把握，从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sup>③</sup>原日本华北方面军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在回忆1944年秋季华北占领区治安状况时指出，1944年末，“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00多个县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几乎没有配备军队、听任中共活动的有139个县，占31.5%……目前治安恶化状况是明显的。”<sup>④</sup>由此可见，到1944年底，日本占领区缩小到“点”和“线”，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显著扩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中共在敌后的局部反攻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一号作战”，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更重要的是，因“一号作战”而扩大的日本占领区内，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进入1945年后，不得不收缩战线，从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撤军，国民党军队乘机进行尾追作战，与敌后战场共同形成了对日军的里外夹击之势，加速了日本败降的步伐。

纵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尤其是敌后战场给予正面战场的巨大支持，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中国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在当今世界，中国正在快速和平崛起，如果国共两党能实现再度携手合作，一定会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

●作者地址：胡德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dkhu@wh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6ASS001)

●责任编辑：桂 莉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50. 华北的治安战 2》，第 481～483 页。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50. 华北的治安战 2》，第 504 页。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50. 华北的治安战 2》，第 510 页。

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50. 华北的治安战 2》，第 536 页。